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

主持人语

在学术史上,毫无疑问,书比人长寿。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而好书的魅力,则很可能穿越时空,被后人永远记忆。日后的读者,与作者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可以更真切、也更超越地看待这些著作。因此,人走得越远,书的大致轮廓以及学术价值,将呈现得越清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谈论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1914—1989),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无论看人还是看事,站得远有站得远的好处,就像唐人王维《山水论》说的,“远人无目,远树无枝”,不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大势”,借此判断是否“特立独行”或“气韵生动”。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

今年五月七日,王先生的弟子及友人等在北大召开“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众多精彩发言中,我们选择了两位北大后学(姜涛、张丽华),请他们进一步完善论文,交给《北京大学学报》刊出,以示纪念。

——陈平原

“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

姜 涛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追溯王瑶先生的学术道路时,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正是“一二·九”时期的政治文化参与,才使得一个左翼学者最初的态度、视野和方法,得到强有力的塑造,这具体表现在对唯物论辩证法的自觉使用以及对一种新的文化运动的构想上。编辑《清华周刊》大概是青年王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践,他所写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当时“新启蒙运动”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在王瑶先生 80 年代的学科规划和 30 年代的批评实践之间,在他晚年的学术总结和早年的方法论自觉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关键词: “一二·九”;王瑶;《清华周刊》;“新启蒙运动”

中图分类号: I 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4)06-0127-10

追溯王瑶先生的学术道路时,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历,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即:在学者王瑶之前,还有过一个革命者王瑶。而且,这两个“王瑶”并非彼此分离,对应于两段人生、两种身份,而是有着紧密的关联。① 先生的同窗赵俪生,就对当年身边这位“小胡风”情有独钟,80 年代读过先生几位弟子的著述后,甚至有这样的感慨:“他后来之所以能带出那么多精彩的研究生”,“其中那股‘气’,是在 1934—1937 年间积贮下来的”②。老同学的说法,看似随意,其

收稿日期: 2014-08-10
作者简介: 姜涛,男,天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① 钱理群:《“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赵俪生:《记王瑶与冯契》,《赵俪生文集》第 5 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7 页。

实暗含了一个特别的思考角度:正是“一二·九”时代的政治及文化参与,才使一个左翼学者最初的态度、视野、方法乃至主体性,得到强有力的塑造;而怎样把握“两个王瑶”之内在关系,不仅涉及理解一个学者的学术养成,也涉及到对一个学科自身传统的深层挖掘、体认。

一

“一二·九”运动爆发于 1935 年 12 月,以北平大中学生游行请愿为开端,几经起伏,其历史能量的释放一直持续到 1937 年“七七”事变。王瑶先生 1934 年 9 月考入清华大学,1937 年 6 月间离校返乡,大学时代恰好与“学运”同步。他所属的“清华第十级”(1934 级),刚入校时也因所谓“反‘拖尸’”组织了起来,在“一二·九”运动中顺势担当了主力,姚依林、黄诚、吴承明、杨述、杨学诚等学生领袖,都涌现自这一级活跃的新生。① 那么,年轻的王瑶如何参与了这场学运呢? 结合相关自述、回忆,我们大致能还原一个激进青年的忙碌身影:中学时代,开始阅读社会科学和左翼文学书籍,“比较早地接受了一些概念式的马列主义的知识”。进入清华后,参加外语系 33 级赵德尊组建的秘密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并以“国防文艺社”“清华文学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当时,小组成员各自发挥所长,“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书,爱写书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被同学称为“小胡风”。“一二·九”前后,曾多次参加救亡游行,并“两系囹圄”:一次是在 1935 年 3 月,因牵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入狱;另一次则因参加 1936 年春的“三三一”抬棺游行。出狱后,1936 年 5 月由赵德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清华暑期周刊》编辑、清华文学会刊物《新地》编委及《清华周刊》第 45 卷主编,发表时评、文论、翻译等文章数十篇。②

上述政治及文化实践,可谓相当丰富,其中有两点似乎可以注意:其一,虽投身学运,表现不俗,但与蒋南翔、姚依林、杨述、赵德尊等不同,王瑶并不属于运动的“领导层”,更多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加入其中,包括 1936 年 5 月的“入党”,也并非出于组织的偏爱,而是学运处于不利形势下中共党组修正“关门”倾向、批量吸收新党员的结果。③日后所拟《自我介绍》也自称:“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④ 其二,“鲜为人知”毕竟出于一种自谦,“诸多平平”其实不乏精彩,且伴随了一种强烈的个人选择性。1952 年 2 月,在知识分子改造(“洗澡”)运动中,先生梳理了早年的一系列政治及文化活动,其中的一段检讨,尤其值得玩味:

> 譬如我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新地》的编辑,也常写时事论文或文艺论文一类文字,于是我就自以为我是一个左翼理论家,很高傲。……现在想起来,就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我就有严重的看不起群众的毛病,当时我写了一些文章,以为这是像我这样人才能做的;而当大家到固安南下扩大宣传时,我却托词不去,认为这是一般群众的事情。⑤

① 所谓“拖尸”(toss),指的是大学中老生欺负新生的诸般“恶作剧”,如“钻狗洞”“抛举”“浇冷水”“戴绿帽子”等,这种习气来自美国大学,流行于 30 年代的燕大和清华。清华第十级入校(1934 级)后,这一校园“传统”却遭到新生的激烈反抗,他们集体行动,散发传单,甚至准备了武器,与高年级学生对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燕京大学。参见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0 页;陈翰伯:《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段》,《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2 页。

② 这段经历的描述参考《王瑶文集》第 7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所收《自我介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年谱》以及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赵俪生文集》第 5 卷,第 110—111 页。

③ 参见《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第 49 页。王瑶的入党介绍人赵德尊也回忆:当时的支部发展很快,“新党员无论是‘民先’队员,还是共青团、‘左联’、社联同志,都由分管文委个别谈心,自愿自觉谈思想转变过程,在斗争中表现积极坚定,举行简单入党宣誓”(赵德尊:《征程鳞爪》,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 页)。

④ 王瑶:《自我介绍》,《王瑶文集》第 7 卷,第 99 页。

⑤ 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文集》第 7 卷,第 495 页。

表面看,这样的回顾处处自贬,却可能是“洗澡”运动中一种特殊的应对策略,简言之:检讨归检讨,白纸黑字,事实俱在,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形象、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其实得到了刻意维护。① 依此逻辑,“高傲”“看不起群众”“托词不去”等小知识分子的劣习,也可从正面解读,暗示了某种介入方式的个人色彩。

作为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运动,“一二·九”包含多个不同的面向:除了示威游行等“高级斗争”形式外,1936 年初北平“学联”就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许多“偏僻的村镇”,进行广泛的乡村宣传;“三三一”抬棺游行受挫之后,学生群体又转换路线,以多种“和平的、沉着的努力”来扩大基础,如在校园内发起各种座谈会、读书会、讨论会,尽量向各界人士寻求支援,慰劳二十九军,组织学生参加军事演习等。② 这些层层开展的运动,确实会向一个积极分子、一个新进党员提出要求。王瑶“托词不去”、以为写文章“是像我这样人才能做的”,“贡高我慢”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对学运的参与并不简单为时代激情推动,而是包含了明确个人的主动性、选择性。作为同学心目中的“小胡风”,他或许已意识到了自己的优势、特长所在,无论编辑刊物,还是撰写时评文论,坚持以理论批评的方式乃至学术的方式介入这场运动,恰恰是“我这样的人”应有的选择。这一选择也包含了对文化与政治有机联动的感知,换言之,革命活动与学术文化,对于青年王瑶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可以分离的领域。

当然,个人选择与“组织”要求难免有所冲突,这也为一个革命者向学者的转化,埋下了伏笔。1937 年“七七”事变前,王瑶向党组织请假返回山西平遥家中,由此开始了一个坎坷离乱的人生阶段。当时的山西,正是北方“抗日中心”之一,阎锡山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也吸引了一批“一二·九”青年的加入(包括赵俪生在内)。③ 先生却在老家与组织“失联”,甚至“脱党”,其中的原委,按老同学的解释,除《清华周刊》停刊和情感受挫造成的情绪低落外,也源于“左倾关门主义残余仍很严重,组织对成员的看法有时很片面”,“为此,他很早就启程返回他的故乡——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隐居起来了”④。

二

在“一二·九”时期的相关活动中,编辑《清华周刊》大概是王瑶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践,以这份周刊为讨论对象,大概能更为集中地呈现青年王瑶的形象。《清华周刊》创刊于 1914 年,在 20 年的沿革、发展中,其“足迹已经踏出了清华园的门槛,社会上已经给它极大的注意和估价”。⑤ 30 年代中期,这份老牌的综合性周刊,色彩也日趋激进,发表大量时事报道、评论,回应紧迫的华北危局。王瑶之前的总编正是“一二·九”学运领袖蒋南翔,姚依林、杨德基(杨述)、赵德尊等都担任过编辑或撰稿人。

1936年 5 月 6 日,《清华周刊》44 卷 4 期“清华论坛”上头条发表的《所谓亚洲国联》一文,署名“昭琛”,这是王瑶在周刊上的首次露面。1936 年 5 月,正是“学运”调整方向、在校园内外扩大基础的时期,王瑶也在该月为党的组织接纳,一种

① 钱理群将这种检讨中的应对策略,命名为“‘但’书”文体:“‘但’之前,是基本事实的陈述,是实实在在的;‘但’之后,是批判与认识,却是空洞的,无法抹杀前面陈述的事实。”参见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华道一:《“一二九”运动一年来之史的检讨》,连载于《清华周刊》45 卷 7、8 期,1936 年 12 月 16、23 日。

③ 据孙陶林回忆,当时北方局曾指示,需要从北平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牺盟会工作,“民先队就动员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民先队的干部。后来,这些人都成了牺盟会的骨干”(《回忆一二九运动》,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7 页)。“七七”事变后,赵俪生也曾前往太原参加“牺盟”的训练班,相关经历参见《篱槿堂自叙》,《赵俪生文集》第 5 卷,第 117 页。

④ 赵俪生:《宛在的音容》,《王瑶和他的世界》,第 15 页。

⑤ 王瑶:《清华的出版事业》,原载 1936 年 9 月 6 日《清华暑期周刊》11 卷 7、8 期合刊;引自《王瑶文集》第 7 卷,第 420 页。

深入参与时代现场的可能,出现在他面前。随后,一篇篇署名"昭琛"的时政评论,连续刊载于《清华周刊》《清华暑期周刊》上,如《沧石铁路的建筑问题》《中央和西南》《华北的汉奸舆论》《西南事件座谈》《绥远局势严重》《西安事变》《山西当局训练民众》等。翻阅这些文章,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感觉些许惊讶,当年一个学生作者竟会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不仅及时又广泛地关注国内外诸多重大的军政事件,如"绥远抗战""西南事件""两广事件""西安事变"等,在分析中也能由点及面,纵横捭阖,提供某种透视性的认识。即如第一篇《所谓亚洲国联》,就从日本倡导组织亚洲国联的消息写起,首先分析了"欧战"之后日本崛起所要面对的国际矛盾,以及其国内"二二六"政变以来"军事法西斯蒂"强烈的抬头,继而比较了所谓"亚洲国联"与法国倡导的"欧洲集体安全组织"的根本不同,呼吁国人打消对于"国联"的幻想,认清日本加紧侵略的现实。文章篇幅不长,却能参照国际与国内,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呼吁一种集体的政治决断。

扩展来看,这样专业化的评论风格,并非王瑶一人独有。《清华周刊》43 卷—45 卷("一二·九"期间出版),发表了大量时政评论,涉及政治、军事、外交、铁路、金融等多个领域,这些文字都不止于简单的报道、表态,而是更多力求进行知识上的剖析、把握,对过于单一的救亡文字,周刊编者反倒有所拒绝,曾明确宣称:"许多救亡理论和救亡实践的文章,我们因为它太注重现实,不防意去登,许多文章意在影射别人,因为它太注重感情,也不加刊登,这便是我们的态度。"①在他们看来,激进的时代姿态本身不足以推动历史,"救亡"实力的养成离不开严肃的学术努力。与此相关,《清华周刊》的另一重点,在于非常主动地介入当时文化界、思想界的变动和争论。仅就 43—45 卷而言,"中国文化本位"、汉字拉丁化运动、"国防文学"、辩证唯物论的普及、叶青的哲学批判等命题,都不同程度得到了回应,以至"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也成为编者的自觉。② 在这一领域,王瑶的批评能力无疑得到了更充分的施展,尤其担任 45 卷总编之后,他一边继续撰写时评、杂文,一边抛出《当前的文艺论争》《报告文学的成长》《表现在作品中的时代和艺术》《一二·九与中国文化》《论作品中的真实》等重磅论文,总体关照当时文学界发生的"两个口号""批公式主义""反差不多"等论战,也及时把握"集体写作""报告文学"等最新的创作现象,一个清华园中的"小胡风",也就这样登场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时政、文化讨论的指向不同,但寻求一种新的知识方式与思想方法的冲动,却被相关论者普遍分享。对于新兴社会科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热情介绍和言说,在周刊上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某种知识前提与方法论上的断裂、重构意识不时流露。③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已作为一种热潮兴起,为历史困厄中一代激进青年提供了理性认识社会走向、指导具体实践的整体性框架。"一二·九"前后,正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流行的时代,学运的兴起也带来了"新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

① 《编辑部的话》,《清华周刊》44 卷 7 期,1936 年 5 月 27 日;1936 年 11 月,刚刚担任总编的王瑶,明确重申了这一态度:"我们知道周刊是一种学术刊物,它也是表现我们研讨成果的园地,所以我们固然绝不忽视救亡,但也绝不空谈救亡,我们相信没有和现实世界超然存在的甚么学术,惟有把学术和现实密切地连系起来才使有价值的学术,也才真正对于救亡有所补助。"(王瑶:《关于第四十五卷周刊》,《清华周刊》45 卷 1 期,1936 年 11 月 1 日)

② 在为《清华周刊》停刊所作《为清华周刊的光荣历史敬告师长同学》中,王瑶历数了周刊的学术影响,包括"销行近万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因为本刊的批评而修正后改为《大众哲学》。最近又有叶青等在本刊上探讨哲学消灭的问题",甚至骄傲地称:"我们说一句《清华周刊》的存在是直接影响中国文化的,也不算是过分地夸大吧!"(《清华周刊》45 卷 12 期,1937 年 1 月 25 日)

③ 相关文章有:起于《文艺批评是什么——李长之君〈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的商榷》(43 卷 2 期)、斯基《当作理论、方法及实践指导看的社会学》(43 卷 7 期)、丘西《读哲学讲话》(44 卷 1 期)、实敏《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法则》(44 卷 2 期)、实敏《理论与现实》(44 卷 6 期)等。

进一步普及。① 青年王瑶就成长于这样的知识氛围中,并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实践。后来,虽自称早年接受的马列理论只是“概念式”的,而他初试锋芒的文字,恰恰显示了唯物辩证批评“非概念化”的活力。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正值文艺界展开着“极广泛和极热烈”的论争,“这当中有两个口号的问题,联合问题,文艺批评公式主义的清算,和创作自由等等”。面对纷纭复杂的现象、交错横飞的概念与口号,如何在使用新兴理论话语的同时,又保持批评的敏锐和现实感,对于一个年轻批评者而言,自然构成了挑战:

> 东鳞西爪地乱说固然不是批评,左一句高尔基右一句吉尔波丁地不顾实地情形地渊博也不能算作批评。批评主要是一个客观认识问题,对于每一个批评对象的正确把握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然,这里对于一个批评家自然需要成熟的文学教养和理论经验等,但更重要的是实践过程中怎样得到的丰富认识能力。②

在 1936 年 10 月完成《当前的文艺论争》中,王瑶全面梳理当时文艺界各种论争,同时也表达了对某种批评陷阱的警惕。依托正确理论,站稳先进立场,便四处出击,颐指气使,这或许是不少左翼批评家的习气。王瑶的态度与此不同,在他看来,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的判断行为,而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需要“正确”理论的支撑,但绝不是理论的封闭生产,一种“丰富认识能力”的获得,需要多方面的准备和修养,尤其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把握动态的情势及总体的关联。

同月,炯之(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著名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斥文坛上的“差不多”现象,一时引来左翼阵营的诸多反批评,王瑶随后发表的《表现在作品中的时代和艺术》一文,就显现了批评意识的成熟。与习见的论战文字不同,此文没有否认当时文坛上“差不多”现象的存在,对于沈从文抛出的一些文艺陈言(“我们翻开每一本古老的文学概论之类都可以看得到”),诸如文学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一类,也大致认可。王瑶的回应一开始就集中在方法论层面:作者虽然看到了“社会现象的一角”,“但他不会从这一角展望到全面,从这一现象透视到本质”,而是因为“心灵中所崇拜的某种超然观念”,“把这一角和周围切断了,而且把它来孤立的夸大为他这一理论体系的证明”。正是这种方法的片面、狭隘,而非具体现象的认定,才导致了相关批判的抽象、无效。③ 这一批评角度新颖,却击中要害,点出了沈从文发言的抽象性。

反观王瑶这一时期的批评,不论纵论时事,还是细查文艺,对于实践进程中诸多现象之关联的重视,对于“一角”和“全面”间总体性透视能力的强调,在他那里被提升到原则的高度。这一原则不只内化到批评意识中,在很大程度上,也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内在支撑了青年王瑶的文化及学术实践。即便谈及理想的文艺创作,他也这样写道:“当他(作家)选定一篇作品的题材时,这题材所表现的将不仅是这事实本身,而是和周围一切的社会现象联系着的”,虽然作家“不需要写每一个社会中的现象,但却不能不去了解每一个社会现象”。④ 这段话不仅是写给作家们的,申张了现实主义的典型性观念,其实也可看作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批评家的自勉。

在后世读者的印象中,左翼批评或许难免沾染机械唯物论、历史决定论的教条气息,但“概念化”的使用并不能掩盖其曾有的历史活力。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过程中,王瑶先生不断强调“必须把作品放在历史过程中来考察”、要注意“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等原则,这个学科凝重、浑厚的历史性品质也

---

① 这方面材料很多,这里仅举一例。清华哲学系的陈其五在回忆中提到:1936 年 4 月后,“党组织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也组织学习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如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 170 页)。

② 狄恩(王瑶):《当前的文艺论争》,《清华周刊》45 卷 1 期,1936 年 11 月 1 日。

③ 甄奚(王瑶):《表现在作品中的时代和艺术》,《清华周刊》45 卷 6 期,1936 年 12 月 6 日。

④ 齐肃(王瑶):《论作品中的真实》,《清华周刊》45 卷 9 期,1936 年 12 月 30 日。

由此阐明。在 80 年代的学科规划和 30 年代的批评实践之间,在晚年的学术总结和早年的方法论自觉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这也暗示革命年代虽已过去,但唯物辩证批评所包含的历史关联感及总体性意识,仍然可以构成学科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援。

三

从某个角度看,坚持以学术、思辨的方式参与“学运”,自觉运用唯物辩证的批评方法,青年王瑶“一二·九”时期的个人路径,代表了“一二·九”的另一重维度:这既是一场学生运动、政治运动,推动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同时也释放了知识的、思想的热情,蕴含了一代人对新理论、新学术、新文化的渴望。可资佐证的是,围绕如何创造一种高水准的救亡文化,《清华周刊》的同仁们确实展开过持续的讨论:1936 年 7 月的“救亡专号”就集中刊出《哲学与救亡的关系(座谈记录)》《科学和救亡运动中科学家的任务》《从现代科学的趋势说到中国现阶段的国防科学》《非常时期与国防文学(座谈记录)》等稿件①,力图在“救亡”的大前提下构建不同学科、领域的发展前景;在王瑶主编的 45 卷上,刘清漪等则就“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进行了多番辩难。所谓“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摆脱模仿,追求独创,在哲学的普遍性中捕捉现实的特殊性,建立某种自主的现代民族文化的抱负,总体贯穿了这场讨论。② 对于这一命题,王瑶也有相当的关切,他在 1936 年底完成的长文《一二九与中国文化》,就集中表达了一代青年的文化自觉、历史自觉。

“一二·九”运动周年之际,《清华周刊》45 卷 7 期(1936 年 12 月 16 日),特意刊出了三篇大文:陈卓生的《一二九运动的意义》、华道一的《一二九运动一年来之史的检讨》、昭琛(王瑶)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意在以亲历者的身份,对一年来的学运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实在是本卷周刊中内容最充实的一期”。③ 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多少会让人联想到“五四”周年时一批五四健将进行的类似回顾,如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等。④ 具体说来,三篇文章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一二九运动的意义》篇幅较短,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整体评价了“学运”的政治意义;华道一的长文分两期连载,着眼于运动本身的展开,详细梳理了各阶段、各环节的成果和问题;王瑶的文章则着眼于文化层面,标题本身就显示了独特的问题意识——“一二九”不仅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而且也带来一种新文化展开的契机:

> 一二九是学生底救亡运动,学生运动曾影响到文化上,对我们已经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我们已经有过五四,而且中国今日所具有的脆弱的新文化的基础,谁都知道是从五四建立起来的。

从“五四”到“一二·九”,相隔不到二十年,两场“学运”之间的历史关联,自然很容易建立。但王瑶的眼光不止于此,他有着自己的着眼点,即:“学运”与新文化之间某种可能的共生性。依照某种观察,以“伦理的觉悟”为最后的觉悟,以文化运动为社会运动的基础,的确是“五四”的一大历史特征;“五四”之后,正是由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社会运动之间有机性的瓦解,才造成了“国民革命”时代的危机——文化运动的特殊性被抹煞了,致使上下失去联系,“政治运动失了巩

① 该“救亡专号”为 44 卷 11、12 期合刊,1936 年 7 月 22 日。

② 包括刘清漪《从哲学的本质性说到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45 卷 1 期,1936 年 11 月 1 日),佟贵廷《谈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45 卷 3 期,1936 年 11 月 15 日)、王铭修《再谈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山红《理论的落后》(45 卷 5 期,1936 年 11 月 29 日)、刘清漪《三谈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辩佟,王,山,三君》(45 卷 8 期,1936 年 12 月 23 日)

③ 《编后琐记》,《清华周刊》45 卷 7 期,1936 年 12 月 16 日。

④ 1920 年 5 月 4 日,北京《晨报》印行“五四纪念增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顾颉刚、郭绍虞等分别撰写了文章,意在总结、反省一年来的学生运动。罗家伦的长文也发表在这一辑增刊及 5 月 1 日的《新潮》2 卷 4 号上。

固的基础,只使运动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①。对于这一“五四”遗产的价值,王瑶似乎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开篇就高屋建瓴,试图重建“学运”与文化运动的关联,即便这种关联还不是自明的,需要被有洞见的批评强力揭示。这也正是《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一文尝试的工作。

以“五四”为参照,王瑶再度施展了他对复杂历史现象的驾驭能力,只不过这一次视野更宏阔,处理的问题脉络更为错综。长文首先从社会分析的角度,交代了“五四”与“一二·九”客观情势的不同,进而讨论了两个时期在文化任务、民主与科学之内涵方面的差异,构造出“一二·九”对“五四”继承又超越的纵向关联(“价值之重估的重估”)。在此基础上,笔锋一转,横向检讨了“学运”一年来“各部门各方面”的成绩,试图将通俗救亡刊物的发达、中国语文运动的开展、“新启蒙运动”和“救亡哲学”的提出、“国防文学”的实践、“两个口号”的争论以及各种协会组织的成立等一网打尽,勾勒出一幅全景式的文化图像,并有所针对地就传统文化的影响、救亡的联合战线、文化运动自身限制等问题展开论述。文章汹涌恣肆、又滴水不漏,其中对于思想领域中“新启蒙运动”的引述,尤其值得注意。

所谓“新启蒙运动”,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曾昙花一现,代表了陈伯达、艾思奇、张申府、何干之等左翼学者在救亡情境中构建新文化的努力。从时间上看,1936 年 9、10 月间,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论新启蒙运动》揭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②,他的提议引起广泛关注及讨论,则要迟至 1937 年以后。王瑶的文章则发表于 1936 年 12 月,他对思想界变动的敏感,可见一斑。就其中有关“新启蒙”的描述来看,如“新哲学”应与现实紧密结合,对于传统思想还缺乏深刻系统的批判,重提“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等,他肯定参考了陈伯达的文章。③ 考虑到“新启蒙”的几位主要发言人与《清华周刊》都不乏关联,这一点倒不难理解。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就是因《清华周刊》的批评,第四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出版④;张申府本来就是有影响力的清华哲学教授,在课堂上经常大放厥词,抨击时政,1936 年 3 月还曾与王瑶囚于同一监狱⑤,其狱中所作《人生的意义》还头条刊登于《清华周刊》44 卷 7 期上;至于陈伯达,也在《清华周刊》上露过一面,这位理论家曾在王瑶主编的 45 卷 8 期上发表过一篇小说《雪夜》。除此之外,《清华周刊》上对“新哲学”或救亡哲学的讨论,在强调知识本地化、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方面,也与“新启蒙”基本同调,是同一历史情境和知识诉求的产物。

事实上,“新启蒙”的提出与“一二·九”,确实大有关联。1936 年春,刘少奇主持中国北方局的工作,陈伯达担任宣传部长,作为领导人之一,也曾活跃于“一二·九”的幕后。⑥ “新启蒙”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民族大破灭危机”的政治氛围,其中关键表述之一,即对“救亡民主大联合”的强调,与刘少奇在“学运”中反对“关门主义”的指示(《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

①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上海生活书店 1937 年版;引自《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3 页。

② 两文分别发表于《读书生活》4 卷 9 期(1936 年 9 月 10 日)及《新世纪》1 卷 2 期(1936 年 10 月 1 日),后都收入论文集《真理的追求》,上海:上海新知书店 1937 年版。

③ 参见陈伯达:《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真理的追求》,第 1—7 页。

④ 《清华周刊》44 卷 1 期(1936 年 4 月 12 日)发表了丘西《读哲学讲话》一文,对艾思奇的著作提出了批评;1936 年 6 月 30 日艾思奇在《关于〈哲学讲话〉》(四版代序)中,大段引述、回应了丘西的批评,也说明了改名《大众哲学》的理由。

⑤ 参见 1980 年 4 月 30 日,王瑶与舒衡哲的谈话(舒衡哲撰、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0 页。)

⑥ 高文华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谈及“一二·九”运动时,提到:“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一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7 页)。

似乎也有潜在呼应。置身“学运”的漩涡中,王瑶对此或许心知肚明,他也有意将“新启蒙”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纳入到“一二·九”文化的整体框架中。但通读长文,会发现“新启蒙”并非简单包容于“一二·九”的文化构想中,两种论述之间其实颇多重叠、相合之处。比如,在“新启蒙运动”的倡议中,陈伯达特别强调对传统思想进行系统批判,原因在于“侵略者”“不抵抗主义者”“各种式类的汉奸”都可能以“尊孔复古”为旗号散布独断、迷信、奴化的意识。① 这种对复古思潮背后政治意图的敏感,也出现在王瑶这里,他在文中花了不少笔墨扫描当时社会“上层”与“下层”中旧文化的影响,所列举的事实也大多曾出现在陈伯达的笔下。② 再比如,对“极广泛的文化联合阵线”的呼吁,是王瑶长文的一个重点,而“各部门和整个文化界的联合工作”还不甚理想(“不是想去征服别人而仍然是自己关起门来,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去迎合别人”),还被看成是当时文化运动存在的一大问题,这显然吻合于“新启蒙”内部“统一战线”的主张。

抛开特定的态度、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新启蒙运动”,还是“一二·九文化”,都奠基于一种紧迫的、具有共识性的时代感觉,即:“必须有一新的文化运动,以作为政治的‘预见’或作它的辅助”③,由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有机想象出发,“五四”自然成为二者共同的历史参照系。④ “新启蒙运动”被陈伯达命名为“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它与“第一次(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时代的歧异”上,其次,五四时代的哲学基础为“形式逻辑”,而支配“新启蒙运动”的则是“动的逻辑”。⑤ 艾思奇则将这个命题放在更长的时段中展开,在他所谓“民族自觉运动”第二个“自为”的阶段,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大革命”、新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显现了“否定之否定”的法则⑥,这与王瑶所称的“价值之重估的重估”,也大致接近。

由此说来,《一二九与中国文化》的写作,并不简单是一次孤立的周年纪念,它超越了学院乃至“学运”的范围,突入了当时思想界的最前沿。青年王瑶有关“一二·九文化”的构想,在引述“新启蒙”论述的同时,也是对后者提出命题的一种强力回应,或更准确地说,是以“学生运动”为视角,在“一二·九”的框架下,重构且更充分展开了“新启蒙”的诉求。站在某种崭新“救亡文化”的起点上,以开创者自居,一代新人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历史主体的意识,就洋溢在这篇万言长文之中。⑦

四

抗战爆发之后,“新启蒙”的提倡很快落幕,

①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真理的追求》,第 10—11 页。

② 陈伯达在《论新启蒙运动》中,列举的“复古”现象包括:“称伪国为‘王道’的乐土”“东京新建了孔庙”“郑孝胥关于‘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解说”“恢复读经,旌表孝子,褒奖烈女”乃至“许多光怪陆离的佛教团体”的建立、班禅与太虚受到社会欢迎等。王瑶在文中提及“礼义廉耻的新生活”“特赦施剑翘等的一大串国有德政”“友邦叫东北为‘王道乐土’”“东京也大建孔庙”“班禅可以祈祷和平”“太虚法师可以赈救灾民”等。不难看出,两人对现象的列举,颇为接近。

③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 401 页。

④ 有关“新启蒙运动”与“五四”的历史连续性,余英时虽然有所质疑,但他也承认:“明显的,被巧妙策划来相互奥援的这两场运动——‘一二·九’与新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不免让人联想到狭义的五四(1919 年学生的示威运动)与广义的五四(胡适与新潮社所谓的‘文艺复兴’)”。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8 页。

⑤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真理的追求》,第 14 页。

⑥ 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原载《文化粮食》1 卷 1 期,1937 年 3 月 20 日;收入《艾思奇全书》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8—302 页。

⑦ 在 1952 年的自我检讨中,王瑶谈及了《一二九与中国文化》所体现的个人抱负:我“认为‘一二九’是第二个‘五四’,是一次文化革命,还以为自己是这次文化革命中的主要人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文集》第 7 卷,第 495 页)

并没有深化为一场真正广泛的思想运动,陈伯达、艾思奇等先后去了延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日后成为中共重要的理论家和发言人。王瑶提出的命题——“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似乎也未得到必要的反响。1937 年“返乡”之后,他遭遇了一段坎坷、离乱的人生,这样才有了后来的选择——进学院、入儒林,革命者王瑶变成了学者王瑶。但这并不等于说,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文化努力,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从一种新的文化构建角度看,“新启蒙”的一系列主张,如“主张文学上的‘民族形式’;主张保卫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传统’;主张对中国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主张通过在中国问题中使辩证唯物主义‘具体化’,从而‘充实’辩证唯物主义”,都指向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并融入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中。①

对于王瑶先生个人而言,“一二·九”时代的政治及文化参与,也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学术起点来看待。一方面,熟练使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在时代状况的全景把握中,在实践过程的诸多因素的关联中,去处理文艺、思想及政治问题,早年的批评实践无疑深刻影响乃至支配了先生的学术道路,也为现代文学学科注入一种浑厚的历史品质。② 另一方面,无论介入“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回应“反差不多”的指斥,重构“新启蒙”的论述,创造一种新文化的自觉,也带来了饱满的历史主体性。后来他依据“新民主主义论”的框架,叙述新文学的历史,这一“理论先行”的做法,更不简单是时代环境使然,而是包含了对这一历史框架的信任,其思想线索就包含在当年的救亡文化构想中。③ 1980 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上,王瑶先生作了题为《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的长篇发言,就现代文学这门“很年轻的学科”的性质、特点、方法、范围、线索、标准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谈及海外学术思路的影响时,先生一段表述意味深长:

> 我们赞成展开广泛的文化学术交流,……,但我们必须首先立足于自己的研究。我们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参加者或见证人,中国现代文学是产生在中国的土壤上的,我们有责任对之作出科学的研究和评价……④

这段话无疑体现了一种对于学科的主体性自信,这种自信源于这样的事实:面对 20 世纪中国革命带来的思想、文化巨变,作为研究者的王瑶先生们,不是局外的观审者,而始终保持了某种内在的理解,即便在历史动荡和知识转型之后,有关“革命传统”的反省和清理,同样应该包含了对研究自身主体性的重申。在这个意义上,追溯先生早年的政治参及与文化实践,其意义便不仅限于纪念、重温,而是涉及现代文学学科传统的体认与转化的问题。当然,在 20 世纪思想史、文化史上,如何评价、定位王瑶先生所提出的“一二·九”时代的文化构想,也值得进一步展开。

---

① 参见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杨悦译,第二章《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5—193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45 页。

② 在 1952 年的自我检讨中,王瑶谈到 40 年代立志成为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第一流的学者”时,认为“研究好这门学问必须三方面都有基础:(一)古书的知识,包括历史和文学,(二)历史唯物论,(三)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我狂妄地以为这三方面我都有些基础。”(《王瑶文集》第 7 卷,第 496 页)即便是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研究,诚如不少论者提出的,其学术趣味和理路,也能见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潜在影响。

③ 钱理群曾指出:王瑶先生在长文《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中的看法,“与以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确有想通之处。王瑶先生在他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作为全书的理论依据,应该说是有思想基础的。”(钱理群:《“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王瑶和他的世界》,第 321 页)

④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4 页。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 and the Starting Point of Professor Wang Yao's Academic Road

Jiang 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hen we study the academic road of Professor Wang Yao (王瑶), we will find that his experiences in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 of 1935 can't be neglected. His early attitude, horizon and thinking method were shaped powerfully during the movement, which were reflected in his consciously using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active conceiving of a new cultural movemen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this thesis reviews the writing and practice of Wang Yao when he was young as the editor of *Tsinghua Weekly* (《清华周刊》), and discusses what he said about the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his article entitled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 and Chinese Culture* (《一二九与中国文化》), so as to outl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revolutionary and a scholar.

Key words: December 9th Movement, Wang Yao (王瑶), *Tsinghua Weekly* (《清华周刊》),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